

高考改革丛书

2000年

高考作文指导与训练



上海远东
SHANGHAI FAR EAST

G634.34
W31c

高 考 改 革 从 书

主编 王大赫 胡江浩

2000年

高考作文
指导与训练

执行主编 王大赫
胡江浩



上海远东出版社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

G634.34

W31C

高考改革丛书 ⑥

2000年高考作文指导与训练

主 编 王大赫 胡江浩



A0916726

上海远东出版社

前　　言

为了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性精神的人才,高考正面临着一场比以往更为深刻的内容和形式的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三个有利”的原则(即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教育部考试中心在《高考内容和形式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明确地提出今后高考命题指导思想是“以能力立意”,“更加注重考查考生进入高校学习所需的基础文化素质。考查对知识的理解、运用、分析与综合的能力”,对语文这门基础学科考查,提出了“强调其基础性、通用性和工具性,突出综合能力和素质要求”。作为语文学科必考内容之一的写作能力考查:语言思维的综合能力和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常见应用文的写作能力,是命题的重点,这是每个备考者和指导者十分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以往高考作文试题的命题思路的分析,以及对考生作文的评析,市面上的书籍都是“自家之言”,标准也不一样,很难反映命题者的意图。我们出版本书的目的就是让全国高考命题者、阅卷教师和考试研究专家来讲一讲他们的初衷,他们根据作文评分量表对考生优秀作文的评析,从而揭示考场作文的命题原则和思想,特别是对2000年高考作文的

命题思路的探究。因此,本书不同于其他作文参考书,作者队伍的组成,显示了它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指导性。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师和部分省、市教委、教研室、招生办同志的支持,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王大赫 胡江浩

1999年11月于北京

·第一部分·

高考作文半世纪回顾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陈佳民

一、天字第一号试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1年开始,我国已经实行全国高考统考39年。在这些统考的年份里,人们一提起高考,首先会想到高考作文,因为在所有各科试题中,就单题而论,它的占分比例最大,答题字数最多,答题时间最长,综合性最高,主观性最强,评分误差最大,影响面也最广。正是有这么多个“最”字,有人就戏称高考作文题为“天字第一号试题”。

这道“天字第一号试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它的答题字数、答题时间和占分比例的具体安排和变化趋向是这样的。

现在,高考作文答题字数一般要求800字左右。文革前,高考作文都没有规定字数。规定字数是从恢复高考后全国统一命题开始的。1978年考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求500至600字,超过600字的每50个字扣2分。1979年考把《第二次考试》改写为《陈伊玲的故事》,要求字数以六七

百字为好,超过800字的每50个字扣2分。从1980年至1983年,作文规定上限不超过1000字(1983年两道作文上限1100字),超过字数的有两年每50个字扣1分,有两年不扣分。1984年开始,高考语文添加了现代文阅读的内容,作文字数的要求相应地作了缩减;同时也发现,作为选拔性考试,超字扣分不合理,因此从这一年开始作文字数改为规定下限,不足字数要扣分。1984年以后,每年的作文字数不完全一样,有不少于500字的,有不少于600字的,有不少于700字的;对不足字数的作文,采取“区别情况,参照评分标准酌情处理”的政策。从1995年开始至今年,每年的作文字数合计,稳定在不少于800字上,对不足字数的作文,规定“每少50个字减1分”。

高考作文的时间,1956年以前(含1956年),高考语文卷上都注明:作文要在75分钟内完成。1957年以后,语文科就再没有某一道题要用多少时间来完成的具体规定了。根据用时与占分的比例,也根据考场的观察,近几年,许多考生60分的作文大致都用6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完成。

高考作文的分数,是在占语文科总分的60%到30%之间徘徊。占分最高的是1953、1954、1955三年,作文一题60分,占语文科总分的60%。文革前的其余12年,作文都是占语文科总分的50%。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1978年作文占语文科总分的30%,1979年至1982年作文占语文科总分的40%。1983年语文科权重加大,满分提高到120分,作文也提高到45分,占语文科总分的37.5%。从1984年至1993年这10年,作文提高到50分,占语文科总分的41.7%。1994年全国高考进入新科目(3+2科目组),一直到1999年,语文科满是150分,作文是60分,作文占语文科总分的40%。

从上面所列举的作文的答题字数、答题时间和占分比例，我们可以看到作文在高考中的分量和地位。说它是“天字第一号试题”，说它是“试题群山中的珠穆朗玛峰”，这都不为过。在高考中，作文写好了，就像一篇难写的文章撰写了一个好的开头，一次渡江恶战攻克了敌人的一个桥头堡，一场势均力敌的足球比赛先打入对方一个球。由于作文在高考总分中所占的分量重，也由于高考作文所考查的能力综合程度高，所以对于每年的高考作文，不仅考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就是中学语文教师，甚至社会舆论也极为重视。

正是因为高考作文很重要，所以在近年关于高考语文改革的讨论中，有人主张提高作文的分值，甚至有人提出“高考只考一篇作文”。笔者的意见是，高考作文是高考语文学科中最带综合性、应用性和创造性的题目，强调它是对头的。高考作文占语文学科总分的比例在 40% 到 50% 之间，应该是恰当的。这半个世纪多数年份都采用了这个比例，实践证明是可行的。“高考只考一篇作文”，它的好处是可以马上去掉语文高考中大部分的“烦琐哲学”。但是，从长远看，效果未必是最佳。写作能力和阅读能力是中学语文的两个基本能力。写作能力比阅读能力的层级要高，写作能力可以包含部分阅读能力，但不等同于阅读能力，阅读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写作，高考不直接考阅读能力，长久势必会削弱中学语文教学对阅读能力的培养，而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的培养又将严重地影响着学生素质的培养。

二、应试特征

高考作文是应试作文，它区别于自由作文的主要特征就

是统一命题。自由作文是作者自定题目、自定内容、自定表达形式；统一命题作文是主考单位(人员)要出题、考生要审题、评卷员要根据试题要求评分。有人极其反对奉命写作，反对出题作文。自由作文无疑更能表现和发挥作者写作的才能，但是如果作为考试，自由作文的难题就在无法防止宿构，谁也不敢保证交上来的作文就一定是考生本人在考场上作的文。为了维护考试的公平和公正，也为了统一评分标准，解放后全国高考作文统统采用统一命题作文，排除了自由作文方式。

高考作文排除自由作文的方式，但不等于完全排除考生作文的自由，因为写作的本质既有规范交际的一面，也有自由表达的一面。完全扼杀了考生写作的自由，那就无异于是在做客观题、填空题，而不是做作文题。作文题应该是高考中最大的主观题，最自由的题目。高考作文是应试，写作要体现规范交际，所以高考作文命题要对考生提出要求和限制，这就是“框限性”；高考作文要发扬考生的个性，写作要体现自由表达，所以高考作文命题要给考生以一定的自主和选择，这就是“自主性”。框限性与自主性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框限多了，自主就少了；自主多了，框限就少了。每年的高考作文命题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就看命题者的认识和技巧。

观察半个世纪的高考作文的实践，可以归纳出，作文命题是从五个层次去提出要求和进行框限的：

- 一、作文的字数、时间和分数。这在上一部分已经说过。
- 二、作文的文体。或是指定写某种文体，如“写一篇议论文”，“写一篇记叙文”，“写一封回信”；或是排除写某种文体，如“不可写成诗歌、小说、戏剧”，“除诗歌外，其他文体不限”。
- 三、作文的内容。这是最重要的要求和限制。比如说，

有一年是指述说“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有一年是限制写有关“习惯”的话题，有一年是要求根据寓言诗《鸟的评说》展开议论。年年内容不相同，半个世纪内没重复过。

四、作文的立意。上一个层次的作文内容只是规定一个范围，有时候还会在这个范围内再进一步，规定了立意，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多数是出现在写标题议论文的时候，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

五、针对性要求。为了配合和落实内容、立意、文体这些大的方面的规定，有时还会列出一些有针对性的要求。例如：写材料作文时，会提出“自拟题目”；议论社会问题时，会提出“联系社会实际”；写虚构文章时，会提出“大胆想象”，等等。

高考作文这五个层次的要求和框限，编成试题的话，通常就组合为“标题”、“材料”和“注意”（或“要求”）三个构成部分。当然，不是每年每道作文试题都具备这三个部分的。如果只有“标题”和“注意”的话，就叫标题作文；如果只有“材料”和“注意”的话，就叫材料作文；如果三个部分都齐全的话，就姑且叫做标料作文。我国的高考作文，50年代和60年代，除了1964年是标料作文（标题是《读报有感》，材料是“关于干菜的故事”）之外，其余全都是标题作文。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80年代，标题作文少了，给“材料”的多了，有标题的（标题作文和标料作文）和没标题的（材料作文）各占一半。90年代，给“材料”的更多，10年里有6年是只有“材料”没有“标题”的材料作文。

回顾半个世纪39年的高考作文，以大作文计算，标题作文20年次，占51.28%；标料作文8年次，占20.51%；材料作文11年次占28.20%。总的的趋势是标题作文越来越少，材料

作文越来越多；作文的“框限性”越来越少，“自主性”越来越多。文革前标题作文占绝对优势，文革后则给材料的越来越多，直至材料作文占了优势。实行高考统考第一年，作文题是《论增产节约的好处》，对内容、立意、文体都提出了要求和限制；而1999年的作文题只给材料“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作为内容范围，由考生自选角度、自拟标题、自定立意、自择文体，“自主性”显然是比50年前大多了。走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材料作文在创设作文的应用情境、开启思维、防止猜题、避免宿构、避开熟题方面略胜于标题作文。而放宽限制，增加自主，则应该是国家强调素质教育的结果。

高考作文对于考生来说，第一个关隘就是审题。试题就像一个鸟笼，考生只能在这个笼子里飞翔，离开这个笼子就叫做离题。传统的标题作文，审题主要是捉摸标题语句的标准含意。例如，1962年作文题《说不怕鬼》，关键词是“鬼”，“鬼”除了表层的“鬼怪”的意思之外，“不怕鬼”还有深层的不信邪的意思。有考生把《说不怕鬼》看成《说不怕兔》，固然是犯了低级的错误；但有不少的考生没有触及不信邪的意思，也属立意不够深刻。而材料作文的审题却要求对“材料”、“标题”和“注意”三个组成部分作准确全面地审读和理解，哪一项审读漏了、理解错了都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例如，1990年，作文题给出“一对孪生小姑娘走进玫瑰园”的材料，大作文要求“就第一个小姑娘的说法”展开议论，有考生写出《小皇帝的弊端》、《独生子女忧思录》这样的作文，就是没有读懂“材料”的含意；1996年，作文题给出《给六指做整形手术》和《截错了》两幅漫画作为材料，大作文要求“以‘我更喜欢漫画《 》’为题，写一篇议论文”，有不少考生只写我喜欢这一幅漫画，没有注意到题目上的“更”字，也没有留意该题“注意”

(2)“议论时要有比较”的要求，没有在比较上下功夫。这些都是因为审题错漏所造成的难以补救的遗憾。

三、内 容 与 文 体

我国的高考是全国统考，高考作文面对的是数量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的考生，所以，作文命题内容的可写性就变成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谓内容的可写性，就是作文内容的难度要适中，范围要人人有话可说，有文可作；不因过难或过易，不因地区或城乡的差别，而影响考生对试题的理解和写作。要尽量让考生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据说，民国初年，有命作文题《拿破仑论》，有考生论曰：“壮士力能拔山，岂不能拿一个破轮乎！”这也许仅仅是一个笑话，但笑话也不能只笑考生，这题目在当时也太超前了。应该说，新中国是非常注意这个问题的，这半个世纪里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偏题、怪题、难题。同时，也没有出现过某一道题难倒了某个地区某一类考生。例如，没有出过一道题叫所有的考生都来描写大海或下雪，因为许多内地考生没见过大海，许多南方考生没见过下雪。但是，百密一疏，有时也不免有稍稍考虑不周之处。例如 1985 年考材料作文，材料说，澄溪中学附近有一家前进化工厂，天天排放有毒的气体和废水。要求考生以“澄溪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反映情况，还要求“适当补充有关材料”。考后就有一些农村考生反映，他们缺乏工厂排放有毒气体和废水的感性知识，难以想象污染的情景。

半个世纪的高考作文，共命大作文题 50 道（1977 年分省命题，没有纳入统计和分析），从内容和文体看主要有三类：

(一) 自述类(占 24%)

这是早期喜欢考的内容和文体,解放后第一道作文题就是《一年来我在课外最努力的工作》,以后从 1951 年到 1961 年 10 年间就出了 8 道自述文,例如《我投到祖国的怀抱里来》(1952)、《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1954)、《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1955)、《记我的一段有意义的生活》(1959)、《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1960)、《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1961),等等。要求考生按照规定的角度分别自述自己的思想、生活、学习、劳动、报考,等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作文题出得很少,间中才可见到。例如 1994 年是要求自述探索行为的《尝试》,1998 年是自述心理承受力的《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这种自述文在中学语文中没有专门的文体类别,通常是分属于应用文、记叙文和散文。写作的本义就是表达自己的思想与生活,高考写自述文可以很好的解决作文题材和写作个性化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许多考生不愿意写出真实的生活与思想,1998 年就有考生用虚构父母双亡、天灾人祸来显示自己的坚韧。如果写自述文体严重造假,就断送了这种文体的考查功能了。

(二) 记人记事类(占 22%)

这也是早期喜欢考的内容和文体。写作成功的一句名言就是:“写你熟悉的。”为了贯彻内容的可写性原则,除了写自述文之外,最好当然是安排考生记述他们所熟悉的人和事。1953 年的高考作文题《记我最熟悉的人》,可以看作是这种思路的最直接的反映,其他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在不同形势下的变化而已。例如,《记我所认识的一个革命干部》(1953)、《我的母亲》(1957)、《记一个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成长的先进青年》(1973)、《记一件新人新事》(1952)、《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

一件事》(1958)、《大跃进中的新事物》(1960)、《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1956)。记人记事类在中学语文里是属于记叙文的，大致而言，50年代前期，命题者喜欢出写人的题目；50年代后期，命题者喜欢出写事的题目。而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在大作文里这种记人记事类的命题竟是少得可怜了。

(三) 议论类 (占 42%)

这是近半个世纪考得最多的内容和文体。第一次全国高考统考的两道试题中一道就是议论题《论增产节约的好处》。60年代开始，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基本上都是议论类的试题。议论类试题又可以分成两种命题方式：

1. 标题议论文。例如《说不怕鬼》(1962)、《谈革命与学习》(1965)、《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82)、《近墨者黑 / 近墨者未必黑》(1992)等。这是传统的议论文命题方式，当然内容是当代的。不过即使是议论文在考场上的鼎盛时期，这种题目也不多。

2. 材料议论文。材料议论文的考题量恰好是标题议论文的一倍。先是考正规的读后感式的，如《读报有感》(1964)、《读〈画蛋〉有感》(1980)、《读〈毁树容易种树难〉》(1981)等。作为议论类试题，读后感比传统的标题议论文宽松；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则多数是考比读后感还要宽松的材料议论文。这种议论文的命题方式往往是给一段材料构成议论情境，然后是“根据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联系实际，展开议论，写一篇不少于×××字的议论文”。例如，1984年针对两段话所反映的情况，联系自己和周围同学的现状，以对中学生作文的看法为中心，写一篇800字左右的议论文；1987年根据育民小学办起了游泳训练班的材料，就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这个问题写一篇议论文。1990年根据一对孪生小

姑娘走进玫瑰园的材料,就第一个小姑娘的说法,联系生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展开议论。1995年根据寓言诗《鸟的评说》,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联系生活实际,展开议论,写一篇议论文。等等。材料议论文的材料,主要是用文字,有时也用漫画,例如,1983年用漫画《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1996年用两幅漫画《给六指做整形手术》、《截错了》。

上述无论哪一类作文题的内容,命题者首先考虑的当然还是上面说过的可写性,但同时也考虑到它的思想性,考虑到它对考生正确思想的培育和引导。只不过这思想性,有的明显一些,有的隐蔽一些罢了。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有时还会出一些紧跟政治形势的试题。例如,1958年5月党中央提出“三面红旗”,两个月后的高考作文出了《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的时候 / 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件事》;1963年初,中苏两党开始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这一年出了作文题《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1965年我国支援越南反美侵略战争,出了作文题《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但是经常出紧跟政治形势的热门话题,一是容易被猜中题,二是报刊杂志上类似的文章也太多,考生容易抄袭报刊的套话。所以八九十年代就转而多出一些有关思想修养的话题。以90年代为例,大多数年份的大作文内容,都是关于思想方法、品德修养的,而且越来越不欢迎空发议论,而是要求针对青年学生,联系实际情况。1997年出了以“乐于助人”为主题的一组材料和题目,对于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起了良好的引导作用,因而受到领导机关的表扬。

以上三类作文的内容和文体,合计占了总数的88%,毫无疑问是我国这半个世纪高考作文的主流内容和文体了。不过除此之外,有三次极为宽松的命题也不能不引起注意。一

次是 1962 年的《雨后》，一次是 1988 年的《习惯》，还有一次就是 1999 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三次作文命题，都是只给一个宽泛的内容范围，没有较确定的思想内涵，没有立意，有一年连标题也没有；文体方面也只规定不能写诗歌，其他文体不限。这样一种框限性极小，自主性极大的试题，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尤其是近年一些报刊大喊“误尽苍生是语文”的时候，“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能够得到好评实在是难得。这种试题的好处是明显的，减少框限增加自主是今后应该提倡的；但是试题的内容和文体限制减少、灵活度增加以后，也给考场增加了把现成作文改头换面、穿鞋戴帽的机会，也给评卷增加了难度，这也是今后要研究的课题。

四、主测目标

写作是用文字外化思维的活动，它是需要思想感情、知识学问、感受体验和文字表达技能技巧等多方面的综合才能完成得好的任务，即使是短短几十分钟的考场作文也不例外。所以，为了准确地测量考生的写作能力，对考生作文的评价也应该是由多个方面综合而成的。但是，高考是大规模的考试，考生多评卷员也多，每年全国光是作文评卷员就成万人，而且需要在那么十天八天内评完。考生的作文不可能也需要每一个因素都拿出来评阅。因此必须选择文章中主要的而又对中学作文教学有良好导向的项目(因素)来评价。那么，对考生的作文应该选择哪几个项目来评价呢？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我国的语文教育专家、写作专家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我国这半个世纪高考作文实践中所选择的项目及其组合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建国初，

是分成三项：思想内容；表达方法、层次、词句结构；正字及标点符号（1954年）。到了1960年又合并成两项：思想内容、语言结构。恢复高考以后，1980年开始是分成内容和表达两项。1985年开始分成内容、语言、结构三项。1993年改为内容、语言、结构、文面四项。1998年又合并为内容、表达、书写三项。

从我国高考作文评价项目的演变看，虽然历经50年，但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多一项或少一项，只不过是分开还是合并的问题而已，评价的因素实质上差不多。但是每个分项中的子项目经过演变却是越来越具体化了。近两年形成的三项组合的分项的子项目是这样的：1. 内容：①审题、②立意、③材料、④针对性要求。审题是应试的作文特有的评价项目，它关系到整篇作文，可以独立分项，但为了防止过分夸大审题的评价权重，且审题与内容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常常把它放在内容项之中。2. 表达：①文体方式、②篇章结构、③语言。3. 书写：①字体、②错别字、③标点符号。分项越来越合理，子项越来越具体，说明高考作文的考试目标越来越明确，评卷越来越追求准确性和可操作性。

高考作文实行分项综合测量，作为选拔性的考试，它有没有在分项综合中确定主测项目呢？如有，那么它的主测目标是什么呢？回顾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结束以来高考作文命题以及评分标准的走向，可以说，主测目标是表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前这十多年，内容与表达大致上是并重的时期。例如1953年高考试卷上就标明：“作文的评分标准——1. 思想内容（占总分数30%）；2. 表达方法、分段、词句结构（占总分数20%）；3. 标点符号（占总分数10%）。”这一年作文占总分的60%，内容与表达的权重是并

重的。整个 50 年代一直到 1963 年都稳定地采取这种政策，只不过措辞有些不同，有时称“两者应该并重”，有时称“全面考虑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文革前一二年作文测试的目标也出现了摆动。1964 年规定作文“考试的目的是考察考生的表达能力。如果试卷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两方面不相应，应以语言表达为主要根据”。而 1965 年则提出“评阅作文试卷应该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在政治思想内容正确的前提下，看语言表达能力”。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 20 年，测量的目标则明确地以表达为主。1980 年至 1983 年的评分标准就规定：作文 40 分，其中内容占 15 分，表达占 25 分。从 1985 年至 1993 年实行综合法评分，将作文分成内容、语言、篇章鼎足三项，虽然没有赋予各项的权重，但评分细则里说明先看语言项，再看其他两项。如果把语言与篇章加在一起成为表达，表达显然重于内容。从 1994 年开始实行分项分等评分法，当年把作文(60 分)划分为内容(21 分)、语言(19 分)、结构(14 分)、书写(6 分)四项。从 1998 年开始又把四项合并为三项，以 1999 年为例，这年作文 60 分，其中内容 25 分，表达 30 分，书写 5 分。分项分等评分法所赋予内容与表达的权重，每年不完全相同，平均计算大约是 2:3，重点显然是在表达上面。

高考作文的表达主要包括文体方式、篇章结构、语言以及书写四个方面。文体方式在中学语文教学和高考作文中常用的是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和应用文。要是作文试题说明“除诗歌外其他文体不限”的话，也不排除有考生会写散文、小说等文体。文体方式除了某种文体的特殊格式和特殊要求之外，主要体现为五种表达方式和两种写作方法。五种表达方